

在山东宁阳华丰镇西故城村，一片不起眼的田野之下，埋藏着春秋时期鲁国成邑的遗迹。这里是鲁国三大权臣之一孟孙氏的采邑，其执政官——邑宰，曾是一位身高不满五尺、相貌奇丑的年轻人。他叫高柴，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，史载他“长不盈五尺”“状貌甚恶”，孔子说他“柴也愚”，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却成了孔门弟子中做官次数最多、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，留下“善为吏者树德”的赞誉。一个被老师评价为“愚”的学生，究竟凭什么在乱世中赢得民心、保全自身？



仇绪芳

岱宗余脉蜿蜒东延，轻街淄水一湾清韵；牛山历经千载风雨，依然氤氲着浩浩齐风。立于临淄牛山之巅，海拔174米的山体，虽无五岳之雄奇，却有茂林修竹覆崖壁，苍松翠柏隐映岗峦。清风徐来，松涛低吟，裹挟着淄水的湿润水汽与千年尘烟，缓缓铺展这座古都三千余载的风云长卷。

南望淄水如带轻舒，蜿蜒北去，滋养两岸沃野平畴，田垄交错间尽是烟火诗意；西瞰临淄新城，楼宇栉比藏古韵，路网纵横贯今时，市井烟火与时代朝气相融共生；北顾齐国故城遗址，残垣断壁隐于绿野，依稀可辨当年“带甲数十万，粟如丘山”的雄姿，亦可遥想“车毂击，人肩摩”的繁闹盛景。这座山，是叩问齐地文明、读懂千古古都的一把钥匙。

牛山本身，便是一部浓缩的齐地史诗。其名由来，流传两说，皆与先贤足迹相融。一上古黄帝蚩尤后，曾命部将在东流海波山捕获夔牛，在淄河岸边山脚下用其皮制鼓，并将牛头、牛骨埋于此山，后因雨季山中似有牛叫而得名“牛山”；一说姜太公封齐定都营丘后，常登此山俯瞰山川形胜，规划都城格局，见此草木丰茂，宜牧宜耕，遂赐名“牛山”，寄寓齐地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的美好愿景。无论何种传说，都为这座青山添上了一层温润的人文底色，让千年古山更具清雅意韵。

山上古迹斑驳，一步一景皆含史。山间步道旁，“景公流涕处”残碑静默伫立，青石碑刻虽经风雨侵蚀，却依旧镌刻着千年之前的怅惘。据《列子·力命》记载，齐景公登临牛山，见林茂水潺，国都锦绣，忽感人生短暂，繁华易逝，不禁涕泪慨叹：“美哉国乎！郁郁芊芊，若何滴滴去此国而死乎？”这份“牛山之悲”，既是古人对生命无常的浅吟，亦从侧面印证了彼时临淄的富庶与秀美。

千年之后，唐代诗人杜牧重阳登高，以豁达笔触消解这份千古惆怅，挥笔题下“古往今来只如此，牛山何必独沾衣”的诗句，旷达洒脱，流传至今。

牛山北麓，管仲墓依山而建，封土高阔，松柏环绕，庄严肃穆间自有先贤风骨。这位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首霸的名相，一生鞠躬尽瘁，以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的治国箴言，为齐国强盛奠定根基。墓前“齐相管夷吾之墓”石碑，字迹依旧清晰。此外，山上牛山寺遗址、

历代古碑、摩崖石刻错落分布，或记山川之美，或载先贤之事，每一处都镌刻着齐地的兴衰变迁，承载着临淄的文化根脉。

山因水而灵，城因水而兴。牛山之下，淄水蜿蜒流淌，千百年来滋养着这片肥沃的土地，也孕育出临淄这座享誉天下的千年古都。临淄古称营丘，为齐国故都，《战国策·齐策》中“车毂击，人肩摩，连衽成帷，举袂成幕，挥汗成雨”的记载，寥寥数语，便勾勒出当年市井喧嚣的图景。这份繁华，始于公元前1046年姜太公因功受封于齐地，定都营丘。他未墨守成规照搬周室礼乐，而是因地制宜、顺势而为，推行“因其俗，简其礼”的政策，尊重齐地渔猎习俗与文化传统，简化繁琐礼仪，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、安居乐业；又依托齐地濒临渤海、淄水贯穿全境的地理优势，大力发展渔业、盐业与手工业，提出“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”的理念，开辟集市、互通有无，让齐地走向富庶强盛。太公之后，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，内修政理、严明法度，外举“尊王攘夷”之旗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终成春秋五霸之首，临淄也成为中原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与军事中心。

战国时期，齐宣王在临淄城西修建稷下学宫，广纳天下贤士，不问派别、不分地域，让各国学者“不治而议论”，自由讲学、著书立说、相互论辩，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上“百家争鸣”的文化盛景。孟子、荀子、邹衍等诸子百家代表人物云集于此，传道授业，各抒己见，让临淄成为当时东方的思想高地与学术圣地，也为齐文化注入了深厚的底蕴。

临淄的历史，既有贤君贤臣的治世壮举，亦有文人墨客的千古才情。曹植游历临淄，写下《感节赋》：“慕牛山之哀泣，惧平仲之我笑。”西晋文学家左思居齐十年，作《齐都赋》，细致铺陈齐都盛景。

从秦汉齐郡治所，到魏晋南北朝州府重地，再到隋唐以降的繁华城镇，临淄始终是淄水之畔的一颗璀璨明珠，传承齐风古韵，续写文明华章。今日再登牛山，一幅生态优美、经济繁荣的画卷徐徐展开。牛山经多年生态修复，植被覆盖率超九成，春有细雨蒙蒙、草木新生，夏有浓荫蔽日、鸟语蝉鸣，秋有丹枫似火、层林尽染，冬有白雪覆岭、静若诗篇，成为市民休闲健身、登高望远、凭吊怀古的绝佳去处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临淄作家协会会员）

行走齐鲁

齐风韶韵话牛山

史料的缝隙中，还藏着一个时常逾矩甚至令人费解的高柴，这些恰恰与他的“愚直”性格一脉相承。

《礼记·杂记》记载，高柴有一次竟穿起妇人的衣服。这在礼制严格的春秋时代，是相当出格的事。曾子见到后当众嘲笑他，场面颇为尴尬。以高柴一贯尊礼的形象而论，此事显得格外突兀。

更引人争议的是他做成邑宰时的一桩旧事。《礼记·檀弓》载，高柴的妻子在成邑去世，送葬队伍踏坏了路旁庄稼，受损的农人前来索赔，高柴却拒绝赔偿，还说：“孟氏不以是罪予，朋友不以是弃予，以吾为邑长于斯也，买道而葬，后难继也。”意思是，成邑主人孟孙氏不会因此怪罪我，朋友也不会嫌弃我，我一直在本地为官，如果这次花钱买路安葬妻子，这清廉的做派后人可学不来。这话说得有些强词夺理、不恤民情。这也恰恰暴露了他性格中固执而不知变通的一面——他不是圆滑的官僚，认定的事便直直地做下去，哪怕看起来不合情理、招人非议。这正是“柴也愚”的另一种注脚。

卫国发生内乱时，高柴选择逃走。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子路，子路闻乱挺身而出，最终结缨而死。而高柴在守门人帮助下逃出城去，幸免于难。后世儒者对此亦有微词，认为他未能赴难尽忠，于大节有亏。也有人认为他辩护：高柴并非子路那样的勇烈之人，以“愚直”立身，能保存性命以继续行道，未尝不是另一种选择。孔子对此未置褒贬，倒是听闻守门人救他之事后，说出“善为吏者树德”之语。

宽严之间的为政之道

尽管有诸多争议，高柴在成邑的执政总体上称得上成功。综合《礼记》《孔子家语》等文献片段来看，他施政的风格是宽严相济、以德化民。

《孔子家语》引子贡的话评价高柴“启蛰不杀，方长不折”——连冬天蛰伏的昆虫都不忍杀害，对正在生长的草木也不忍折断。这种近乎极致的仁爱之心，延伸到治理一地时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据传，高柴妻子在成邑去世时，送葬场面“人车夹道”，可见他深得民心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柴只讲宽厚、不讲原则。他的宽厚恰恰建立在对规则的严格恪守之上。在卫国做士师时，明知犯人有可悯之处，仍依法行刑，决不以私害公。

高柴在孔门中的地位，后世给予了充分肯定。自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配祀孔子起，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封其为“共伯”，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又加封为“共城侯”。他的著作《子羔》篇失传两千余年，直至20世纪末才从战国楚简中重见天日。

（作者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理事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孙晓明

“泣血三年，未尝见齿”

高柴，字子羔，亦称子臬，子高，大约生于公元前521年，比孔子小三十岁。关于他的籍贯，历来有卫国、齐国、郑国等多种说法，但其所出之“柴邑”，据考证就在今新泰市楼德镇古柴村一带。他出身并不显赫，却以德行闻名于诸侯之间，尤其以孝道著称。

《礼记·檀弓》记载：“高子臬之执亲之丧也，泣血三年，未尝见齿，君子以为难。”父母去世后，高柴守丧三年，日日悲泣，哭到无声，泪尽继之以血，整整三年，未曾露出一丝笑容。孔子评价说，即便对德行高尚的君子而言，做到这个地步也太难了。

高柴的孝名远播，在就任之前就已民间产生了震慑与感化之力。《礼记·檀弓》记载：成邑有一平民，兄长去世后本不打算穿丧服，行为放荡，不守礼法，可当他听说高柴要来做成邑长官，立刻主动穿上丧服，依礼行事。高柴人品的影响力，甚至超过了政令的威慑力。

孔子常将高柴与曾参、子张、子路并称，认为他虽生性朴拙，却有着深厚的道德根基。

上海博物馆1994年购藏的战国楚简《孔子诗论》中，有一篇题为《子羔》的文献，记录了孔子与弟子子羔（即高柴）之间的对话。好学的底色与笃行的品格，使高柴成为春秋末期一位有影响力的思想者和教育者。

审案时“愀然不乐”

高柴先后担任鲁国费邑宰、成邑宰、武城宰和卫国士师，是孔子弟子中做官次数最多、历时最长的人。而真正让他名垂后世的，是在执法中展现出的“树德”智慧。

《说苑·至公》和《孔子家语·致思》记载了同一个故事。高柴在卫国担任士师期间，依法惩处了一名罪犯，施以“剕”刑，砍去其脚，并罚其看守城门。后来卫国发生内乱，高柴仓皇出逃，跑到城门口时，正撞上那名守门人。高柴以为对方必定趁机报复。不料，守门人却说：“城门口危险，您到我家来躲一躲吧。”高柴大惑不解：“我当年对你处以重刑，你为何不借机报复？”守门人答道：“我受刑，是因为确实犯了罪，罪有应得。但您在审理时反复掂量，想尽办法为我开脱减刑；当无法赦免、不得不行刑时，我见您‘愀然不乐’，面露不忍之色。我由此断定，您是一位既不徇私枉法又心怀仁爱的君子。我佩服您，所以要救您。”

孔子听闻此事后感慨：“善为吏者，树德；不善为吏者，树怨。公行之也，其子羔之谓欤！”高柴的做法，正是“树德”的典范。

“愚直”而矛盾的高柴

然而，如果只看到高柴宽厚仁爱的一面，便不是完整的高柴。

史海钩沉

被孔子说『愚』的弟子高柴

『长不盈五尺』『状貌甚恶』，何以成为『树德』典范——



高柴字子羔，鲁人，共城伯。

投稿邮箱：qlwbrwqilu@163.com